

# 第一章

## 导 论

马茨·伦达尔 本诺·J·恩杜鲁

经济发展常常包括经济增长与分配两个问题。当一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长时期持续增长，同时又没有出现收入分配情况的恶化或绝对贫困人口的增加，发展就产生了。我们说经济增长，还意味着使用资源（其中有些是不可再生的），为此必须附加一个条件，即增长是可持续的，亦即，在经济增长中必须计算资源消耗以及环境恶化的代价。增长不应有障碍，但资源必须同时留给子孙后代。

涉及到此内容的论文都试图反映出经济发展的上述含义。同时，这些论文还关注了 20 世纪即将结束时发展所面临的其他重要问题。在这许多问题中首要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及其代价。增长这个在 20 世纪 50 年代比发展还要关心的问题，在 90 年代又一次成为最前沿的问题。所谓新增长理论内在地包含技术变化，不仅关心资本的形成（50 年代的情况）而且关心诸如人力资本开发与研究的发展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等决定性因素。为了认识增长过程的复杂性，经济被分解成不只一个领域，在经验主义一边，兴趣已经从类似 80 年代剧烈的经济危机之类的短期经济稳定问题，转移到长期问题，包括结构改革、制度要求、创造一个使经济增长的环境。

对增长的关心反映在前 6 篇论文中。有 3 篇都集中讨论了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问题。环境问题是经济学长期要应对的问题，无论是资源经济学还是福利经济学中外部性问题的讨论以及公共选择理论。发展中国家今天都面临森林砍伐、土壤退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严重的问题，然而，少数发展指标体系试图在发展指数中考虑进

环境因素只是最近几年的事。

本书的第二部分集中讨论的问题是政府的作用。与 50 年代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一样，50 年代人们也相信政府行为能促进经济增长。尤其一些主张政府干预的人更认为有秩序的计划作为发展政策能弥补市场经济的波动性。众所周知，政府计划化被证明不是好吃的“布丁”。过去 20 年的趋势是从经济控制到经济市场化，因为市场能造就发展的动力机制，尽管自由放任主义仍没有在今天贯彻到底。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引人瞩目的成功，以及有关政府在这些国家经济中干预的性质及其程度的不全面的看法，使得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争议重新抬头。这反映在最后 7 篇论文中。

### 经济增长、创新与环境

在过去 40 年中，经济增长占据着发展经济学文献中核心位置。经济增长能带来民族国家的繁荣和福利的改善。经济福利有时确实建立在经济增长成功的基础之上。因此，发展战略将注意力集中在通过取得高的经济增长率来消灭贫困和提高生活质量是很自然的事。

这种战略在过去经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受发展中的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在实施经济增长战略中得到的经验的影响。早期的理论强调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此，强调动员储蓄作为取得高投资的主要手段。生产力增长被认为是外生的技术进步所驱动。当贫困国家能赶上步伐，资本的预期回报率相对较高时，世界经济的收益有时也被认为无条件地向这些国家集中。宏观经济政策被认为对长期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因为经济增长是受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等外生因素所驱动。然而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增长理论证明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人力资本和政策在长期增长中有重要的位置。技术进步从人力资本投资、规模经济和外国技术的引进中受益，这一观点被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收入上的差异所证实，经验还表明，收益的集中是以其他增长基础条件的改善为条件的。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经济学还在对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稳定问题的关注上出现了摇摆。此外，这种变化强调市场导向的激励机制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与生产力增长。对其他基本原理关心很少。然而，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地停滞表明，这些被忽视了的问题也同样重要。而且，因为这些国家的可持续增长对环境资源的依赖性很强，生态日益遭到破坏，使得对为了子孙后代保护环境资源的关切程度不断提高。

有 6 篇讨论长期增长的论文都强调了长期宏观经济稳定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同时，这些文章还指出了经济增长中需要注意的其他几个问题。它们强调，为保证短期改善措施能与促进就业、投资和技术革新的长期目标一致的稳定协调的发展政策是必要的。这些论文还指出了促进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的恰当的制度环境的重要性。

论文还指出，发展中国家为保证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需要使其生产结构合理化。文章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一个战略，可以实现扩大经济活动范围，吸引外商到落后地区投资、共同保护和管理资源，以减少风险和不确定性，并保存稀有资源。在技术变化的长期循环模型中考虑了创新的作用，并且指出，为跟上迅速创新的世界潮流，需要提供必要条件。

有 3 篇论文讨论了环境资源过度开采，以及如何为保证子孙后代的福利合理地利用资源等与环境相关的问题。它们都以代际平等作为出发点，都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意资源约束的必要性。这些文章还认为，必须改变市场与政府失灵中使特定的政策手段扭曲的现象，以改善越来越严重的生物多样性被破坏的局面。这些观点及其潜在的影响将在局部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失败和全球拨款失败中得到检验。

## 第二章梗概

乔斯·玛丽·法内里和罗伯特·弗兰克的《从稳定走向增长的宏

观经济政策》一文，讨论了宏观经济政策和发展政策的协调问题。本章应用拉丁美洲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经验证明，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市场普遍化以及政府失灵条件下，宏观经济与发展政策之间缺乏协调，将导致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与不确定性，而这又反过来阻碍了投资与创新的积极性，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提高。本章给出了导致协调失败的四个关键原因。它们是：脆弱而有定额的资本市场；因为税收和财政制度不健全而导致公共部门产生不合理的赤字；无法对外部冲击进行灵活反应的生产结构；缺乏对周期性波动导致的资源缺口进行及时的金融支持。

与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目的在于减少投资及就业率的周期性波动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将调节短期经常项目和财政失衡作为自己的目标。这种过分强调平衡的偏见导致稳定和发展政策之间不匹配。作者强调，为达到在持续增长的基础上鼓励就业、投资及创新，政策之间的协调是十分必要的。他们还特别强调，必须考虑经济结构稳定政策的长期结果以及维持短期稳定的结构调整的影响。

法内里和弗兰克考察了 20 世纪 80 年代在拉丁美洲的政策协调失败。由于这种失败使得宏观经济不确定和不稳定，并使得国内资产者宁可可将资产转变成国际性流动资产以随时能进行资本外逃。因为政府与国内私人投资者对国际贷款利率有限，实际投资低于潜在投资。在 90 年代，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扭转了资本外逃的趋势并扩大了资本的短期流入，这已经产生了很有意义的与长期外部平衡并不一致的真正的货币增值以及资源配置。在所有的案例中，令人失望的结果都源于基本政策协调失败。

法内里和弗兰克指出，20 世纪 90 年代宏观经济政策和发展政策之间的协调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首先，提高投资和储蓄的比例必须通过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强调节约的古典主义传统；强调投资者“本能冲动”的凯恩斯主义；强调“分配效率”的新古典主义；强调“鼓励创新”的熊彼特传统。第二个挑战是由于资本市场不健全和国内对金融资产的有效需求缺乏而导致的金融系统的脆弱。第

三个挑战是强化财政结构以弥补不合理的财政缺口的必要性。在这方面，尤其要注意财政政策多重目标之间的协调，特别是在宏观经济稳定和鼓励生产性投资之间的协调，主要任务是在提高营业性收入所得税的同时使其导致的分配影响扭曲最小化；法内里和弗兰克鼓励减少使用税收手段以通过使纳税人对前景充满希望来避免“财政反抗”。调整政府投资和反贫困计划的开支结构是一件好事。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挑战在于，通过创造能对外部冲击进行灵活反应的生产结构以及提高接近短期资本的机会，来避免发展过程的中断。总之，法内里和弗兰克的论文描述了增长的理想宏观经济框架，以保证降低在适度通货膨胀、适当与稳定的汇率、能提高投资和储蓄率的财政平衡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同时有一套用来弥补市场失灵的战略干预手段。

### 第三章梗概

在《非洲发展的障碍》一文中，阿尼·比格斯滕研究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这些国家相对于其他有能力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增长持续低迷。论文首先对各种解释经济增长表现的理论进行了考察，并指出三个因素——资本积累比例、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效率——已经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论文还认为，技术进步从人力资本投资、存在规模经济以及有机会引进国外技术中受益；“后发国家”的优势，部分的与以比发明者低得多的成本采纳现代国外技术有关。但与此相反的是，非洲经济因为很低的资本积累比例、缺乏规模经济、消极的生产力增长以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越来越大的技术水平而抵消了这种优势。

比格斯滕然后对进一步调查的重要领域进行了轮廓性描述，集中讨论了能够促进资本积累与有效率的配置以及更好的技术引进的合理的经济与制度环境。在确认在宏观经济政策改革中进行了相当的努力以及有相当的进步的前提下，指出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三个关键领域。首要任务是确定不稳定与不连续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

了投资的积极性；沉重的债务负担也对改变政策和增加的外部冲击施加了压力；不确定与极度缺乏的信用对投资者是个极大的障碍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二个问题是从鼓励出口增长的东亚经验中采纳什么样的有选择性的市场干预范围。论文强调了选举目标代理的透明性和合理的制度发展的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为减少交易成本，交易规则及契约强制必须很清楚。最后，比格斯滕强调了对鼓励基于法治而不是人治的政策干预的政治过程进行研究，采用什么样的机制能够造就强有力的政府而不至于施加过度的政治强制与干涉。

#### 第四章梗概

易卜拉欣·埃尔巴达威和本诺·恩杜鲁的《次非洲撒哈拉地区的长期发展和可持续增长》一文，集中讨论了次撒哈拉地区长期增长的障碍及前景。论文的分析是基于广泛的经验材料的基础之上，这些证据表明，即使是考虑到所有的增长的基本要素和政策因素，非洲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也很难解释。

论文区分了限制次撒哈拉地区长期增长的三类约束条件，首先是与增长的基本条件相关联，其经济呈现出以下特征：庞大而落后的基础设施，脆弱的制度，处于雏形的技术，相对较低的人力资本，以及影响储蓄和投资积极性的不稳定的宏观经济和政治环境。埃尔巴达威和恩杜鲁回顾了关于长期增长和这些基本条件之间的关系的经验研究，并运用他们自己的经验分析证实了这些因素在解释非洲增长乏力以及在赶上世界发展步伐失败中的重大意义。

第二个约束条件是非洲经济结构的断层。这种断层使得非洲经济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并减弱了其对这种影响的反应能力。论文评估了因为贸易外部条件的变化导致的外部冲击对收入的影响、利率和外部中间产品净输入等对国民收入的影响。

与传统学说相反，在次撒哈拉地区的非洲国家因为外部冲击导致的国民收入损失明显高于其他发展中地区。外国资源的净转移至

多仅仅能部分地抵消持续下降的进出口交换比率。论文还根据非洲经济对外部冲击反应能力弱以及对暂时性波动的清偿能力很低，指出了这些波动的间接影响。这种间接影响包括，生产者为了应付持久的不可预计的外部冲击以及为应付冲击的恶劣的政策环境刺激所做出的不可更改的资源配置决定。最后，埃尔巴达威和恩杜鲁指出，在非洲经济中外部和财政压力之间存在着链状联系，沉重的债务负担是迫使其审慎地应付外来冲击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个约束与非洲市场狭小，以及处于世界主要经济增长极的边缘这样恶劣的战略位置有关。论文指出，构成战略性互补以及吸引足够水平的投资对于现代化和技术进步是极度必须的，但非洲经济在此问题上失败的。论文还提出了从人力与物力投资以及国内不稳定导致的地区溢出效应问题。最后，论文强调指出，地区层次的政策协调以支撑改革，以及为达到行动的起码规模和吸引投资进行区域联合的其他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东南亚的发展经验表明，非洲国家应对工业化战略进行反思以避免过去因进口替代战略以及依赖过去投资选择性而导致的惨重损失。论文强调指出，政府干预的选择性与透明度、开发不熟练工人的比较优势、提高人的能力以及科技能力，是这些成功实践中重要的经验。

## 第五章梗概

克拉斯·布伦德纽斯的论文《痛苦的转制：经济增长模式、长周期和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的思考》，讨论了技术变更的长期循环模型背景下增长过程中技术创新的角色。这样的循环模型以从一种“技术—经济范式”向另一种技术经济范式转移为特征。这种转移与成本有关。

布伦德纽斯的中心论题是，一个国家要想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就必须相对较早地在一个康德拉耶夫周期中采用新的技术，或者使自己站在一个高的位置以预见未来哪种新技术将被应用。论文中的

证据表明，当技术变更时，已经使自己能从下一个长周期中优先技术中获益的发展中国家能赶上富裕国家，而那些将自己锁定在原始技术的国家将落后。根据布伦德纽斯的看法，赶超过程决定性地依赖于能否适应在经济——技术范式由此向彼的转移过程中世界市场的迅速变化。这种适应需要社会制度的改变、以及企业对刚浮现的商机的反应能力。

作者通过对“开拓者”、“后来者”以及“后来后来者”之间的比较研究来证明其所持观点。当一些国家在某个阶段受阻或失败时，那些发达国家正在成功地实现转移。通过前四个周期，像美国、德国、瑞典这些“后来者”能够赶上开拓者（如英国），并且通过革命性的技术突破超过了开拓者，这些国家将在信息和通讯技术的驱使下，现在已经处在能够把握下一个技术——经济范式机会的位置（第五周期）。

像阿根廷、巴西这样在第一个周期中已经取得合理的快速增长的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在第四个周期中实现快速增长的前苏联，由于无法实现向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而绊倒了。其他国家如印度，也因同样的原因而处于停滞状态，布伦德纽斯指出，惟一已经能够使他们很好地适应第五次周期转换的“后来者”国家是东南亚国家。

布伦德纽斯的论文中的证据给出了在世界由以机械技术为标志的第四个（康德拉耶夫）周期进入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五个周期时发展面临的两个关键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东南亚国家经验所表明的，这次转换为发展中国家实现跳跃式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这次机会产生于能提高人类的努力的微电子和信息技术，这些技术建立在廉价的取之不尽的硅资源以及更容易获得的技术的基础之上。

第二个问题与能否抓住这次机会的条件相关这超出了当前流行所谓最快的路径是贸易自由化与竞争性环境的观点。论文对支持学习过程的政策和企业反应能力划出了底线。因此，就无须过分强调为从这次机会中受益需要更好的智力。而且，后来者可能会陷入



从前工业国模仿主导国家的经验的懒惰之中，布伦德纽斯从这些看法中得出结论，大多数后发国家实现赶超战略的前景不容乐观。

## 第六章梗概

马利尔·R·巴加万在其《结构调整的技术含义：来自印度的一些教训》一文中，考察了印度过去 45 年来技术政策的演变过程，并且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所面临的挑战。这种演变过程发生在两个主要阶段：国家在促进技术进步中担当主要角色的封闭经济时代（1950—1984）以及私人因素与外国企业担当重要角色的自由与开放经济时代（1984 至今）。巴加万认为，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演变起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政府所有权以及对经济控制权逐渐衰落，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这种趋势得到强化，并且在 1991 年通过结构调整计划后得到加速。

在第一阶段，印度通过其技术政策，成功地提高了其吸收新技术能力，增强了其摹仿和引进大量国外现代标准技术及一些高度现代化的生产资料的能力。巴加万以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大幅度削减作为证据。并从细节性更强的企业层次上，证明消化国外零部件、产品改造与多样化是成功的，并从此研究出发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这些成就是在政府研究实验室、印度技术研究所和工业企业内部进行研究与开发的努力的结果，所有受保护的机构与技术以及技术培训都通过公众计划进行，这支持了这方面的努力。

但是，巴加万也花费了篇幅讨论关于取得技术进步的经验以及这一时期的技术政策。首先，在获得设计和革新新的标准技术的能力方面是失败的；其次，在从持续增长的技术进口中消化吸收高技术方面是失败的；在这些情况下，公共机构和内部研究与开发的努力是不充分的。企业的业绩的证据表明，其主要关注点放在提高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和劳动效率方面，企业认为创新的成本太高且没有意义，公共实验室和研究所既缺乏资源，又缺乏对企业需求的反应。第三，技术发展的结构不利于科学家和工程师，也不利于技术

人员。在与南韩技术结构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巴加万认为，颠倒的金字塔状的技术结构是技术进步的障碍。

在印度经济走向开放与自由化的第二阶段，外国公司的参与以及高技术进口迅速增长，在拆除了以前一些障碍的刺激下，与国外企业的技术合同成倍增加。对生产资料的进口限制已大量减少，对一些新企业以及老企业的扩张的许可证制度已经取消，关于垄断和贸易限制的条文已经废除，公有公司也暴露在竞争性环境中且其对其评价建立在业绩的基础之上。

巴加万对新的政策体制提出了一些疑问。首先，他看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技术的极化以及二元嵌入现象。一方面，中等和大规模的企业在放弃使用本国技术的同时增加了对进口现代高技术的应用，而另一方面，小规模的企业却将持续使用地方性技术。这样，二者之间的技术裂缝（断层）将会扩大。其次，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地方生产力吸收高技术的能力都被巴加万所怀疑。因为他看到，当面临挑战时，对来自工厂一线的技术人员进行高技术培训是相当艰难的。再次，巴加万认为，相对于高技术的流入和标准技术的无约束，企业认为进行设计和创新需要更多的资源和能力，因而，也对企业进行技术开发与创新构成负面刺激。第四，他设想小规模企业可以排除专利权限制进行侵占。新的政策环境使得它们有可能替代中型或大规模企业。第五，因为高技术的转移，熟练劳动力将在没有吸纳机会的情况下越来越过剩。

巴加万在论文最后认为，解决挑战有多样化的选择。包括再培训和工作岗位再布置战略、小企业的增长和通过技术升级的现代化、加强对新技术吸收的内部研究与开发以及调整教育、员工和国家研究体系的结构。

## 第七章梗概

比约内·黑特纳的论文《发展的区域主义》，讨论了作为发展战略之一的区域主义的出现及加速。黑特纳认为，新区域主义与早期

企图通过建立如自由贸易区之类区域集团以解决市场狭小问题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也促进在成员国以及地区组织之间的贸易往来，但三个明显的特征使其区别于早先的组织。首先，新区域主义强调成员国之间的安全系统的协调，以防止出现政治上分化以及将资源用于应付国内冲突以支撑发展——和平红利。其次，这些新实体逐渐被作为解决跨越国家界限的生态问题的工具。再次，新区域主义提供了一条避免在全球经济飞速增长以及世界范围内发展不平衡背景下边缘化的途径。

黑特纳对新区域主义达成以上目标是持乐观态度的。与老地区主义不同的是，新区域主义强调“区域”的概念甚于仅仅限于参与对全球支配权的安排。冷战的结束在这种转换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他认为，与原来通过上层政府默认来获得其支配利益不同，新实体是由下层的广泛的没有政府利益的企业、工会、以及其他社会运动组成。新区域性组织适应了全球经济的开放。与老的封闭的区域主义不同之处还在于，新的开放的区域主义在解决区域内问题的同时寻求与 GATT 条例保持高度一致，这些规则和条例就是联系地区利益的纽带，并且缓解地区利益和全球化过程之间的矛盾。它们确保社会能抵抗因市场扩张带来的潜在的分裂的压力，同时又不妨碍利用全球化过程受益的机会。黑特纳将其喻为分散的 GATT 体系。

为了阐明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具有新特征的地区组织的能力，黑特纳突出了在每一积极性特点战略中的最主要特点。“生存经济”这一章特别谈到了非洲和加勒比海，这一地区最主要的问题是避免边缘化。他认为非洲的情况要通过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以求得长期的改善。但与此同时，黑特纳也强调了通过加强次区域的积极性如建立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以及西非国家经济组织等逐渐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这些及其他诸如干旱和广泛发展政府机构等组织的目标，超出了促进贸易而进入政治、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黑特纳认定通过采取类似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改革而达到经济、政治政策的协调将有助于实现成功的一体化。

至于加勒比海盆地的情况，黑特纳注意到了这一地区的经济结构正从早期自给自足向强调建立在每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上的专业化分工过渡。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等外部世界的变化和冷战的结束，使得这一地区的联合尽管面临诸多障碍但已经提升了对边缘化和经济可行性的关心。因为这一地区政治上越来越同质，一体化的前景变得很乐观。黑特纳总结认为，这些经济和超政治因素将推动加勒比海国家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

有效的全球行动的观点被东南亚国家的经验很好地证明。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得到强化以及区域集团的出现，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寻求逐渐地将区域内利益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结合起来。黑特纳认为这种优势是建立在以中国——日本为核心以对抗欧洲堡垒和美国的“开放区域主义”的特征。

黑特纳还以事例证明和平的分享促进了中东地区国家一体化。尽管这一地区在语言、文化和宗教方面的高度同质，但其安全却充满了未知数且冲突不断。地区同质已经得到并继续保持加强，黑特纳总结认为，区域发展过程建立在以色列——约旦——巴勒斯坦三角关系对和平进程的共同推进以及整个地区发展的基础之上。

最后是南亚国家，作者注意到这一地区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分离战略已经走到尽头。尽管这一地区仍充满了冲突，但各种形式的区域合作已经积极反对地区霸权主义。发展地区主义还处于萌芽状态，但黑特纳看到了局部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他认为对共享的水系进行共同管理将在未来强迫区域经济走向一体化。

## 第八章梗概

帕塔·达斯古普塔和卡尔·约兰·马勒在他们的论文《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中，考察了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论文的主要目的是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资源管理中的代际紧张。这些资源包括可再生的和无法再生的资源。论文实质上将这一问题的解决放在同时兼顾短期经济福利和最佳发展理论的位置上。作者

指出，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环境资源的储存大幅度下降，而是如何寻找一种最佳的资源利用模式以实现人类社会长期福利。在这个意义上，可持续发展对保证子孙后代的福利的资源利用有严格的约束。

这种关切来自于以下诸因素。大多数贫穷国家为了生存对自然资源严重依赖，并且仍然没有弥补环境资源破坏的能力。由于过度开垦导致土壤退化以及由于灌溉系统不健全导致土壤盐碱化就是这些国家发展基础脆弱的例证。由于缺乏信用，保险和资本市场也未能发展起来。直到最近，政策形成中的环境资源基础恶化问题仍未引起重视，对发展经济学的培训也一样被忽略。作者认为，近来对环保问题的重视已经过度倾向于注意环境资源的急剧下降，而未注意到硬币的另一面，即社会福利。此论文提出了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的路径。

达斯古普塔和马勒对首先解决代际福利的资源利用的思考开始。优先的假定是，代际平等必须作为伦理的目标得到尊重。所采用的最佳办法则是为保持代际福利而严格限定一些条件。这就要求历时消费趋势的贴现率必须低于社会投资收益率（或资本效率）。如果这个条件满足了，历时消费将不会下降。因此，他们的观点与目前所流行的零消费贴现率相反，他们强调了福利贴现率与消费贴现率之间的区别的事实。

然而作者也注意到，在现实世界中要计算出最佳资源分配方式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他们提出了涉及到恰当的社会成本——收益分析的次优方案。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被作为案例。作者在这种分析中强调，必须纠正由于诸如缺乏产权的期货市场以及存在交易成本而导致的市场失败。他们认为，近来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经济研究中莫名其妙的结果就建立在简单的社会成本——收益分析上。这种研究的结论认为，计算现期现象的努力的社会成本将超过收益，而这种收益将在长期中自然增加。作者认为这种结果忽略了规避未来风险的必要性，甚至包括社会灭绝的可能将与环境问题相联系的特殊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社会贴现率的使用考虑进去，对研究问题

有决定性作用。

为了达成上述认识，为了能够正确估价历时综合福利的变化，首先需要对福利的组成进行正确的测度。达斯古普塔和马勒指出了现行的将计算国民收入净值作为社会福利的指示器的方法的弱点，即忽略了社会和环境相联系的部分。他们认为，正确的计算实际国民生产净值的方法，必须一方面扣除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本储存贬值，另一方面要加上用于防止环境破坏的定期经费和环境保护资本的净增值。作者进一步强调，计算产品和服务的影子价格在估计实际国民生产净值中是必要的，这些需要从经济短期最佳中派生出来。作者总结认为，如果这样使用价格，他们将能够设计出一套方案，这套方案可以显示出，由于环境恶化导致的社会收益比现行计算方法要低得多。

达斯古普塔和马勒的论文为正确评估环境资源管理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框架，它与后两篇讨论环境保护的专门问题的论文相得益彰，并为突出后者提供了相关的经验。

## 第九章梗概

戴维·皮尔斯的论文《全球环境价值的获取》讨论了因三种类型经济失败导致的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三种经济失败是：局部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失灵和全球拨款失灵。这导致了全球环境资源配置不是最佳。论文特别强调了平衡来自于土地转换和土地保护的收益以作为最大限度减少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损失的方法。

尽管皮尔斯认为，由于人口绝对密度增大的压力因而指望保存如此多的世界上多样化的物种是不现实的，但可以通过设立在国际公约下的基金的调节作用以及发展从保护生物多样性中获益的互惠贸易来减少生物多样性的损失。论文表达了对单纯强调基金用于环保的流向的关心，注意到此基金在（CED 国家占到了 GDP 的 0.8% 已远超过整个政府间发展援助仅占到 GDP 的 0.36%。因此，皮尔斯极力强调采取在区域以及国际层次间的互补性措施，以

实现土地转换和土地保护之间的平衡，同时制止从土地转换利润中获取非法所得。作者还强调了重视在全球层次对缺损的全球市场栖息地和物种的价值功能。

皮尔斯引用了一个特例以说明私人和公共冒险计划的失败。其中的一些是有规则地进行指导的，而另一些则是市场自发交易的结果。他提倡，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要广泛地采取正确的国内政策，因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全球资源损失的经济方法还停留在口头上的承诺，远未建立基金。尤其是，作者还迫切地认为，必须采取能够使环境价值通过市场价格和经济人之间的契约而内部化和资本化的计算方法，作为此行动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即填平地区性和全球性缺乏市场的鸿沟。

## 第十章梗概

托马斯·斯特纳在其论文《环境税改革：理论，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和不发达国家的关联性》中，考察了一国内解决经济增长和环境资源有限性之间潜在的矛盾的不同方法。他回顾了政策决定者为提高环境资源配置效率而不以放慢经济增长目标为代价的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尤其是与公共开支相联系的部分。由斯特纳提供的旨在同时获取环境保护红利和政府税收增长的主要工具是所谓“绿色税”。在注意到公共产权管理单纯依赖于税收的局限性的同时，作者还描述了他们在纠正市场失灵和提高社会在使用可耗竭资源中的效率方面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论文回顾了能促进同时达到税收增值和环境保护双重目的的税收改革类型。像瑞典这样的国家所追求的环境保护利益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基础型工业的高度依赖上，并且在大型公共开支投资计划中对税收集约型使用。斯特纳搜集了大量的与环境有关的产出税并且评估了他们的预算和环境保护影响。他们中的主要在于与能源相关的税收，包括汽油、煤、天然气、液化气和电力。其他税收是直接来源于机动车所有者和使用者以及烟草税。

回到发展经济学，斯特纳特别指出了一些国家曾经有过的旨在税收增值的有限的税种中选择，这些国家在环境保护计划中资源很贫乏，且他们人口的生存对自然资源有高度依赖性。在此境地下，论文强调，启动绿色税以达到多重目标尤其具有吸引力。这样做的战略企图包括，既避免由于环境毁灭性破坏带来的损失，又要以用绿色税收所能够给予的大范围补偿。包括对水、废物、能源、肥料、木材砍伐和其他自然资源租金。

### 政府的角色

当前最激动人心、结果最富争议性的一个发展问题是政府当前在经济中担当的角色以及将要担当的角色。在 20 世纪 50 到 60 年代发展经济学的黄金时代，政府的角色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可。建立在凯恩斯遗产和福利经济学基础上的政府干预是一个法则，市场失灵被认为在欠发达国家普遍存在，政府的定位就在于通过普遍的积极的经济政策特别是通过计划来纠正市场失灵。

计划模式的动机在于发展。这种模式中的多数对利用市场机制持悲观的态度。从今天看来，增长导向结构具有强烈的刚性并缺乏弹性。高度集中的宏观经济模型和投入产出分析建立在影子价格而非市场价格的基础之上，全面利用来提高第三世界市场机制的表现。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计划的狂热平息下来，潮流转向对市场的兴趣。逐渐地，人们发现实践中的计划和理论上的计划等于在最坏的情况下互不相干的两个不同的运动。理想的计划结果——明确目标、鉴别约束、选择方法、计划定量和计划实施——经常被政治家、官僚机构、游说者、地方百姓等所干扰。事实上的结果总比计划者预料的要差。此外，关于错误的干预政策的信息不断积累，比如，在国际贸易领域。同时，关于政府能最大程度体现居民利益“计划”观点也被证明并不必然是现实的。政府只强烈关心某些集团的利益——极端的情况就是只关心政府本身的利益——的情



况出现也完全可能。随着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公共选择理论的问世，“政府失灵”成为一个新的流行语。20 世纪 90 年代初东欧剧变及苏联解体将全面计划化钉死在棺材里。

市场已经在过去 20 年间猛烈回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政府行为都撤出，相反，二战以后发展最成功的雄辩的故事发生在日本和东南亚——并且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其成功还远未搞清楚。已经给出的解释包括了范围十分广泛且分歧很多的观点，有人提出“市场基础”论，有人则试图说服人们如果没有政府广泛的多领域干预，“东亚奇迹”是不可能发生。

当然，这又产生了诸多问题。是否那里的政府对发展过程的干预没有同时破坏市场机制？“非古典”领域成功的政府干预的存在是不是未能进行充分的探究？或者政府的角色是否是最小的一个？“好统治”的全部含义是什么？本论文的第二部分探讨了这些问题。

## 第十一章梗概

克里斯特·冈纳森和马茨·伦达尔的论文《好的、坏的和摇摆不定的政府形式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表现》，讨论了发展中国家各种类型的政府。第一部分是关于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失败的无效率政府。作者区别了两种不同的原因：一方面缺乏意愿；另一方面信息和管理费用的存在。毫无疑问，最大的困难在于前者，那里的政府没有承担发展的任何义务，特别是在独裁和自利主义的政府中，因为这很容易使政府掠夺成性。

道格拉斯·诺斯曾指出过，作为一条法则，历史上产权的一般设置倾向于生产停滞而不是增长（作者称其为诺斯法则），掠夺性政府的组成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冈纳森和伦达尔从这里出发去解释这种类型的政府是如何产生的，首先是权力局部地集中，然后是组成更大的集团，这样，组织就解决了，再后来是在地区性或全国性层次上。

掠夺性政府的统治者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关于结党以分享战利品